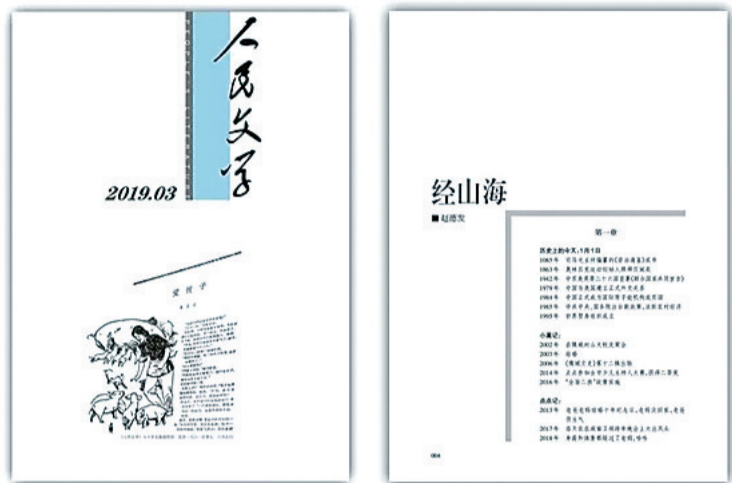


◎文学聚焦

扶贫文学： 叙写新时代乡村传奇

李雪梅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方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新时代呼唤作家聚焦于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一系列反映精准扶贫的作品脱颖而出，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和表达。

当下变革结合历史传统

书写大时代，需要具备足够的思想穿透力，如何穿透繁杂的现实，在零碎的细节中把握时代的总体性特征、理解时代的精神内涵，对作家而言有相当的难度。善于将精准扶贫给当下农村、农民和农业生产带来的变化置于丰厚的历史土壤中进行表达，是新时代扶贫文学的一个特征。贺家湾的十卷本《乡村志》本着“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志，替农民发言”的宗旨，以贺家湾为中心，探讨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最后一卷《天大地大》尤其将重点放在精准扶贫上。当精准扶贫被置于阔大的历史背景下，贺家湾也成为当代中国乡村变迁的一个缩影。赵德发的《经山海》每一章开头都有一个引子“历史上的今天”，将当下置于更加悠远的历史时空，把乡村扶贫工作中的每一点变化都纳入正在进行的历史进程，在宽阔的历史视野中映照出新时代的生机与力量。李明春的《山盟》则从20世纪的革命传统中追寻时代脉搏，村头岩壁上的石刻“共产党是给穷人找饭吃的政党！”是当年红军刻下的誓言，它提醒人们，当下的扶贫工作和革命传统一脉相承。小说中早年参加红军的爷爷、长期投身民政工作的父亲和现在作为驻村干部的孙子一家三代从事农村建设的家族史，正是这一革命传统的真实写照。这些创作将精准扶贫工作置于较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有利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新时代乡村的特征，建构乡村审美经验。

外部帮扶激发内生动力

驻村干部大都是从城市到农村开展扶贫工作的，

“外来者”视角就成为当下扶贫文学的主导性叙事模式。但是，外来者如何才能真正进入乡村内部，关涉到文学呈现出怎样的乡村经验，如果仅仅停留在无关痛痒的外来者视角或者机械的政策解读层面，就会影响写作的有效性。不少扶贫文学坚定人民性立场，采取平视视角，致力于表现扶贫干部的成长、帮扶对象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改善，成为新时代扶贫文学的一个特征。譬如《经山海》《天大地大》《酒是个鬼》等小说在外来者视角中加入成长

小说的元素，将基层驻村干部的成长与乡村面貌和村民命运的改变结合在一起，反映出扶贫工作既是帮扶他人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的机遇，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内涵。同时，扶贫文学并未停留在对国家帮扶政策的解读上，而是试图表明，政策的外在力量与农民内生力量的结合才是实现脱贫的必由之路。老藤将《战国红》的叙事重点放在激发农民的主动性上，曾经的文艺青年、网红和村里其他年轻人逐步成长为乡村建设者；陈毅达的《海边春秋》里，开发海岛的主体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正是他们在与外来资本的博弈中，实现了家乡发展。这些扶贫干部和乡村中坚力量交相辉映，共同建构起新时代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一手材料孕育个性表达

火热的现实和身临其境的生活体验提供了大量崭新的文学素材，扶贫文学中不少故事都直接源于作者的扶贫日记或访谈等一手资料，这是时代与生活的馈赠。在充分把握时代精神的前提下坚持个性化表达是新时代扶贫文学的一个特征。韩永明的《酒是个鬼》聚焦精神扶贫，不仅让扶贫对象老谢通过“扶志”重获做人尊严，也让扶贫队员老王在忘我的工作中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自我成长。在此，国家话语与个性表达得到统一，既聚焦乡村扶贫须挖掘内生动力这一重要话题，又延续了韩永明一向关注转型期普通人精神状况的写作特点。晓苏在《撒谎记》中以不无反讽的笔法续写他的油菜坡故事，陈应松在《火烧云》不无残酷但也不乏温情的故事中丰富着他的神农架系列，这些作品既具强烈的时代特征，又有作家鲜明的个人烙印。

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与探索也丰富了乡土文学的美学特质。扶贫工作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和工作流程，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和考核目标，如果没有独特的艺术眼光和感悟力，很难讲出好故事。老藤的《毒蛇》一改就事论事的写法，仿照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的形式徐

徐展开，不仅让小说更好看，随着真相被解开，也将“呼蛇容易遣蛇难”这句谚语延伸开来，让每一个人反观自己内心的那条“蛇”，引发读者思考。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以残障儿童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有温度的脱贫攻坚故事，李司平的《猪嗷嗷叫》则以轻松幽默的形式书写乡村扶贫过程中的一场“闹剧”，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探索。

同时，减贫工作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应当注意的是，简单化的乐观想象也会远离乡村现实，像《迎风山上的告别》中深山里的每个残障孩子都因为过人的文艺天赋脱贫，《猪嗷嗷叫》的结尾用一句“村里的野猪养殖场弄起来了！村里的人都顺利脱贫了！”宣告胜利，或许都有些失之理想化。当作家以在场的姿态进入乡村的精准扶贫现场时，如何跳出繁复庞杂的表象，冲破僵化的思维定势，在更广阔的时空里建构新时代乡村叙事的坐标，是每一个写作者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乡村前所未有的发展，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现代化的整体社会图景，对新世纪乡村的文学想象也远远超出20世纪乡土文学的启蒙模式、浪漫田园模式和社会主义农村题材模式。正如贺家湾的《天大地大》开头乔燕的遭遇所隐喻的那样，乔燕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进入贺家湾的第一天，不断将眼前的景象和想象中的乡村对比，发现她进入的是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境，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农民。如何尽快读懂乡村，是乔燕开展工作第一紧要的事，如何理解和书写当下乡村的新变化，则是每一个写作者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新作评介

在原野中捕捉诗意的精灵

——读张炜《我的原野盛宴》

王一梅



《我的原野盛宴》被称为张炜“迄今唯一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此之前，我们熟悉的是作为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的张炜。“野地”“莽野”“大海”“葡萄园”等是其文学谱系和精神谱系中频现的意象和关键词。这一次，作为非虚构作者的张炜真正将这些抽象的关键词具象化和实体化，为读者娓娓道来他的童年成长往事。

新世纪伊始，张炜在异国彼岸的一场演讲中曾深情回忆“我的更具体的出生地”：“它就是渤海湾畔的一片莽野”，这里到处是树、野兽，是荒野一片、大海，很少看到人。他说：“我的大多数时间与外祖母在一起。满头白发的外祖母领着我到林子里，或者我一个人跑开，去林子的某个角落。我就这样长大，长到上学。”20年后，这个有关“我的更具体的出生地”的故事终于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

海边野林中的小院是记忆的起点，“盛宴”从这里开始。共襄这场“盛宴”的既有“我”和家人，也有小伙伴、采药人、猎人和打渔人，还有与“我”共同生活在这片原野的360余种动植物。作品的前三章似一首隽永的田园叙事诗，其间不乏曲折生动的泥屋探秘和林中冒险故事，间或有人与动植物和谐共处的

动人场景。林中老人讲述的自然传奇更为这首写实的叙事诗带来了几分魔幻色彩：林子里的精灵会请客，各种野物会潜入人类的居住地偷酒喝，每个领地里都有一位野物担任“滩主”（管辖者）。在这里，“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变得模糊，而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却成为“尊重自然”的最佳注脚：人类并非自然的中心和主宰。第三章最后一节“荒野的声音”可以看作是这首叙事诗的尾声，在不急不缓地讲述和一点一滴的情感蓄积后，“我”终于听懂了大自然的声音，能够自由平等地与大自然展开对话，而正是这荒野的声音，“才把海滩和林子变得更大，大到没有边缘”。此刻，“我”完成了童年成长的第一阶段。

从第四章开始，“我”暂时告别了外祖母和海边的小屋，去往灯影开始一段校园生活。生长于海滨野地的自然之子初人有着一高围墙的小学校园，各种规矩让“我”感到不适应。大自然以奇异的本领，为“我”注入了自由真诚的天性，森林和大海才是“我”真正向往之的“课堂”。但是，成长不可逆转，“再两年我就会离开灯影”，“走出灯影的那一天就是一个真正的大人了。我知道不可能一直待在外祖母身边，不会在茅屋里住一辈子，而一定会到别处去”。那么寻找一个让自己满意且幸福的“别处”就成为现实问题，作品的第五章就在这种对人生意义的寻求中缓缓展开。相较于前四章，第五章更像一首深沉低缓的哲理诗，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之前似乎有意模糊的具体时代背景在这一章中得以或明或暗地显现。“传书”“葡萄园的梦”“背诵”“小岛一日”“会议论的人”“诉说的鸟”“落叶”，每一故事的背后分别寄托了作家对知识、梦想、困境、真理、诚实等命题的追求与思索。这也印证了张炜在作品扉页写下的那句话：“文学既是浪漫的视野，又是质朴的视野。文学的一生，应当是追求真理的一生，向往诗境的一生。”

从“融入野地”到“我跋涉的莽野”再到“我的原野盛宴”，一直以来，“寻归荒野”就是张炜坚守的理想。对作家来说，“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城市所代表的无穷无尽的欲望破坏了人类的自然天性，而未被工业化和现代文明侵扰的野地却还保持着美好、纯洁的人性。因此，“寻归荒野”一方面重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意在倡导以自然的美好代替“文明”的矫饰。

与作家以往的作品不同，这一次，张炜不再是显在于文本中忧愤深广的智者，也不再是高蹈理想主义的作家，他把自己完全交还给童年的“我”，让一切自然发生。正如曼德尔施塔姆的那首《只读孩子们的诗》中所写到的：“只读孩子们的诗，只珍重/孩子气的思想，扔掉/那成熟的一套/自深深的忧愁中站起来。”《我的原野盛宴》兼有人类学的朴素、哲学的幽思和宗教的悲悯。

“我点点头。是的，从今以后，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了。我信心满满。”整部作品收束于此，我相信作家也在此刻完成了一场漫长的告别。告别的过程充盈着田园牧歌式的私人记忆，闪烁其间的是有关亲情、友谊、成长、自然的记录与哲思。这场“原野盛宴”不光是视觉的，“看的见”的，它同时调动起不同的感观，最终呈现的是一场全感观和立体的自然之旅和审美体验。“盛宴”将读者与作家联系起来，沟通作品内外的世界，也将人与自然连接在一起。

张炜在《我的原野盛宴》发布会现场说，碎片化阅读已成风尚的网络时代，应该愈加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是最高级的语言艺术才有意义，才有存在下去的一点可能”。在一种随着岁月的积淀而日趋成熟圆融的艺术风格之外，《我的原野盛宴》也或多或少代表了张炜应对时代挑战的选择——保持语言艺术的神圣性，这也许是作家理应承担的角色。

当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金属体”，所有人情世故和曾经的温馨纷纷剥离的时候，也许作家能有办法把一缕缕情怀、一丝丝悸动，像笨手笨脚的泥瓦匠一样重新糊上墙面，堵住缝隙。

◎百家谈

畅想未来的文学创作

张世勤

在未来，社会生活面貌的急速变化将在所难免，今天的各种社会职业都将面临科技冲击，数十种传统职业将消失，机器智能的崛起会让不少人成为“无用之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也需要接受洗礼，重新寻找方向。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古老而充满力量，是人类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光匆匆，不着痕迹，能对抗它的或许只有文字。人类的意识、感觉甚至一切创造，或许都会转瞬即逝，唯有付诸文字，才有可能成为永恒。

中国古人“三不朽”的论说中，其一即是“立言”，即通过文字实现不朽。总想着让自己的作品永恒难以从从容，而从容的状态对于传世之作的诞生来说却十分重要。从容，对一个作家来说，绝不单单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能力。能够用作品去兜住社会的震荡，用文字去咬住多变的生活，用思想去穿透尘世的迷雾，用形象去挑战人心的外表，用气蕴去传递性灵的美好，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如果按这个标准，能做得来、做得好、做得成的，一定不会太多。

人工智能已经打败了最高明的棋手，接下来也许还会打败更多其他方面的专业人士。在机器彻底打败人类之前，作家们应该还不会存在失业之忧，尽管智能机器也能写作。原因是，文学是写人的，写人的命运、人的意识、人的心灵。社会虽然在剧烈运动，人类也在渐趋进化，但人类在心灵这方面的进化却很难寻觅到可见的轨迹。服装、发型、语言等都会因时而变，却唯有心灵难变。如果这么说过于庞大和笼统，那么操作人性这个小切口，情况便十分明了。人性是否是个体进化的存在，很值得讨论。这简直就是专门给作家们留下的一道难解之题。其次，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图景，作家的作用在于，在他不可能给出清晰完整的答案时，有可能会让人向着清晰和完整更近一步。另外，即使纳米机器人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诞生，进入人体血管进行巡航，但它却无法把个体生命的意识和感觉通过巡视准确无误地报告出来，这就跟使用倍数再大的显微镜，也无法看清楚痛苦和爱情的体验是一样的道理。

痛苦和爱情的体验是无法数字化的，所有的意识和感觉也难以量化，但这并不妨碍数字化科技的到来。数字化虽然很冰冷，但却精准，而且也很高效，将来社会出现“无意识”运转并非没有可能。而且，连科学家自己也不敢判定，智能机器人在到达一定阶段后，是否会产生出属于它们的共同意识。当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金属体”，所有人情世故和曾经的温馨纷纷剥离的时候，也许作家能有办法把一缕缕情怀、一丝丝悸动，像笨手笨脚的泥瓦匠一样重新糊上墙面，堵住缝隙。

不仅如此，作家们还需要应对因生物技术和基因科学发达带来的人类寿命的不断延长。寿命的增长与智能机器人队伍的日益壮大和无所不能迎面相撞，到那时，人们到底是更加需要文学还是根本不再需要文学，不得而知。或者说，真正考验作家们的时候到了，这就要看这时的作家到底能给予人们什么？尤其是，当智能芯片可以植入人体，或脑机接口技术彻底完善，相遇的双方即使陌生却很清楚对方在想什么、要什么的时候，作家一定会陷入前所未有的窘迫之中。写什么、怎么写、写给谁看、作品意义何在，这一系列老生常谈的问题，会再次浮出水面。生死、命运、爱情、人性这些过去曾被冠以永恒的文学母题，或许也会大打折扣。终生与一个或多个机器人生活在一起的情状，也许存在。文学以虚构为障眼法，通过超越真实而抵达真实，通过模糊而实现具体，通过读者的二度创作形成一千一万个“哈姆雷特”来体现作品的价值和生命力，但将来的二度创作环节什么样，现在却很难说得清。

即使面向未来，作家的地位和创作意义会发生深刻改变，但不可否认的是，科技对创作的冲击也会倒逼作家在文学性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与尝试。“文学何为”这个传统命题也将绽放出新的魅力。

